

從《楚辭評註》看明末清初的學風轉變*

陳煒舜

佛光大學文學系

引言

屈子向被尊為詞章之祖，四部分類法中的集部也以楚辭類為先。作為中國文學源頭之一，《楚辭》的地位是無庸置疑的。可是，由於傳統上詞章一直是義理的附庸，無論王逸《章句》、朱子《集注》或其他為數不少的楚辭學專著，研究方式都是以義理闡發為首要，詞章賞析次之。明代中葉以後，隨著程朱道學的僵化、陽明心學的興起，研究《楚辭》出現各色的方法。嘉靖、萬曆之際的學者如周用、汪瑗、陳深、張鳳翼等重新審視屈子思想，並以此為基礎來探析《楚辭》文本，《楚辭》的詞章研究自此邁進了一大步。此外，楊慎、黃省曾、屠本峻、張之象、陳第、焦竑等人，對楚辭聲韻、訓詁、詞彙、修辭各方面的研究也逐漸深入。明末政治黑暗，清初又逢滿漢衝突，於是出現了大批的孤臣孽子、志士遺民。他們於屈子有強烈的共鳴，楚辭學也因此大盛，專著如黃文煥《楚辭聽直》、漆嘉祉《楚辭補注》、甯時《屈辭疏指》、李向陽《離騷注》、汪陸延《離騷注》、李陳玉《楚辭箋注》、賀貽孫《騷筏》、周拱辰《離騷草木史》、錢澄之《屈詁》、王夫之《楚辭通釋》、洪舫《離騷辨》、吳光裕《離騷副墨》等等，皆成書於此時。這些著作或申明忠君愛國的志節，或舒洩懷才不遇的哀憤，或訴說身陷囹圄的不平，或寄託故國黍離的愁思，令人目不暇給。

明末清初的楚辭學專著中，由王萌主筆初刊於康熙年間¹的《楚辭評註》（下稱《評註》）不太為當今學者留意。除饒宗頤《楚辭書錄》、姜亮夫《楚辭書目五種》、崔富章《楚辭書目五種續編》著錄外，僅洪湛侯主編的《楚辭要籍解題》（下稱《解題》）

* 本文於2004年春訪問湖南理工學院時動筆；寫作期間，得滬上徐群、彭方、楊月英女士、梁穎先生協助查找、核對資料，深表謝意。匿名論文審查人就本文給予的參考意見，啟我良多，亦在此一併致謝。

¹ 此據饒宗頤之說，見饒宗頤：《楚辭書錄》（香港：蘇記書莊，1956年），頁21。

和潘嘯龍、毛慶主編的《楚辭學著作提要》(下稱《提要》)二書就其內容作較詳細的論述。根據《解題》及《提要》，《評註》的內容可以歸結為以下四點特色：(一)善於闡述《楚辭》文義，解說通俗易曉；(二)注釋解析時注意藝術性，其中還有一定的藝術欣賞成份；(三)字詞訓詁雖主要依王逸、洪興祖、朱子，然也時出己意，解釋更細緻，且注意通俗；(四)用互證、比較的方法，加深對作品的理解，以騷解騷，以詩解詩。²

《評註》的頭兩點特色，具體而微地反映出晚明的文學風氣。萬曆中期以降，經濟繁榮，評點之學盛行。陳深《屈子品節》、馮紹祖《楚辭章句集評》、蔣之翹《七十二家評楚辭》、陸時雍《楚辭疏》、來欽之《楚辭述注》、毛晉《屈子》、陳仁錫《屈子奇賞》、潘三槐《屈子》等書，在注文以外常常通過眉批、總評、集評等來進行章法分析。由於這些評點著作的讀者不再局限於士人，更涵納了普羅大眾，因此其解說文義自然偏向於易曉。進而言之，評點之風又與晚明師心自用的文學主張密切相關。公安三袁提倡獨抒性靈，矢口成文，率意發一時之興會。竟陵鍾惺、譚元春則主張經過默察深思而鏗入外物的深層次處，以追求幽深孤峭、孤行靜寄的境界。公安的狂放、竟陵的狷潔，都貫穿著妙悟性的審美情趣。四庫館臣謂鍾惺、譚元春《詩歸》「點短一二新雋字句，矜為玄妙」，³雖語帶貶斥，卻正說明了師心說者「為藝術而藝術」的傾向。回觀《評註》，雖然沒有眉批、總評等部份，但其注文內容卻顯然受到晚明評點風氣的影響。此外，由《評註》第三、四點特色，可以看到各種學科及方法在明末清初漸次的融會、整合。「以騷解騷，以詩解詩」其實就是內證、外證的運用，即周用《楚詞注略》所謂「比類而觀」。⁴《提要》謂以楚辭證楚辭，前代已有，然像《評註》如此大量者，確乎少見，⁵這顯示出明代中葉以後考據學的發展對楚辭研究方法的影響。復次，《評註》的字詞訓詁細緻，行文通俗，固然是對王逸、朱子舊說的補充申發；由此亦可見到，考據學不再是讀書人在故紙堆中的小眾遊戲，而成為了用以協助大眾欣賞詞章的得力工具。

由於王萌的生平事蹟淹沒無聞，難以從知人論世的角度來分析《評註》的內容。實際上，此書雖題為王萌評注、王遠考音，卻是伯侄二人合著。現根據上海圖書館所藏清周若鴻批注康熙刊本(下稱上圖本)，以節數為綱，對王萌評注及王遠按語的數量作一統計，表列於下：

² 見洪湛侯(主編)：《楚辭要籍解題》(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潘嘯龍、毛慶(主編)：《楚辭著作提要》(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³ 清永瑆(主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頁1759。

⁴ 明周用：《楚詞注略》，上海圖書館藏清順治九年(1652)周之彝刊本，〈自序〉，頁一下。

⁵ 《楚辭著作提要》，頁160。

表一

	總節數	評注條數	按語條數	無注有按	有注無按	注按皆無	他人評語
卷一	94	88	52	6	42	1	5
卷二	55	50	45	5	10	0	6
卷三	94	77	73	17	22	0	2
卷四	154	137	55	17	99	6	7
卷五	36	32	7	4	29	4	2
卷六	33	32	5	1	28	0	1
卷七	22	9	4	13	18	11	0
卷八	43	39	9	4	34	4	2
卷九	27	25	9	2	18	0	0
卷十	43	31	5	12	38	12	0
總計	601	520	264	81	338	38	25

此表所錄，全取自正文之注釋，王萌題下小注及王遠考音不計在內。

由表一可見，大約平均每兩節正文，就出現一次王遠按語，頻率頗高。王遠按語篇幅多廣，且常有繫於一節之下而兼論數節的情況；再加上考音部份，實際的討論範圍，比表二所顯示的情況更為廣泛。統覽上圖本，王萌以注解和評文為主；而王遠除考音外，按語甚多，於義理、詞章、考據方面皆有涉獵。因此謂《評註》為伯侄二人合撰，毫不為過。清代以來有些學者論及《評註》，往往合王萌、王遠而一概相量，歸美於王萌，未有詳加剖析。如梁簡能解〈禮魂〉，稱許王萌「憂楚絕不祀」之說，⁶ 其實此乃王遠之說。唯有晚清鄭知同在《楚辭考辨·總辨·匯楚辭注家》中，提到《評註》作者是「王遜直偕侄帶存」，⁷ 似乎注意到兩人注文風格的差異。王萌生於晚明，詩文宗竟陵，入清後寂寥終身；王遠則活躍於康雍盛世，曾兩為清廷官員之幕僚。故《評註》一書中，伯侄二人之論每有不同之處。王萌評注多本於王逸、朱子之書，而王遠按語則於楊慎、黃文煥、陸時雍、周拱辰、林雲銘諸家之說每有參酌（《提要》謂《評註》「注釋多依王逸、洪興祖，其次依朱熹，其餘幾乎沒有涉及」，⁸ 不盡然）。通過對《評註》的探析，觀照晚明至清代學術風氣的

⁶ 梁簡能：《楚辭九歌注箋》（香港：仁學出版社，1982年），頁35。

⁷ 清鄭知同（著）、蔣南華、黃萬機、羅書勤（校注）：《鄭知同楚辭考辨手稿校注》（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1。

⁸ 《楚辭著作提要》，頁159。

演變，是饒有興味的事。可是，此書雖在清代數度刊行，民國以後卻幾無重印，以至流傳不廣。本文根據上圖本，嘗試在《解題》、《提要》等著作的基礎上進一步探析二王的楚辭學特色，比較兩代學者治學方法的異同，重新思考明末清初學術風氣的演變，並為此演變的軌跡提供一些佐證。

《楚辭評註》著者生平及著作考略

王萌、王遠伯侄乃湖廣天門人，其行跡不見於各種《楚辭》輯注、書目的紀錄。考清人章鐵所纂《天門縣志》有王萌小傳：「王萌，字遜直。童年出口成詩，機神天遂，譚元春(1586–1637)早識之。事親至性，不隨年疏。檢束笑言，不使志放諧俗而自矩。不求名而讀書，終其身貧窶，著身皆韻也。」⁹觀《評註·自序》題款云「疆〔疆〕圉大荒落仲冬長至日裝溪在叟王萌書於蠟梅花下」，¹⁰《天門縣志·藝文志》又有其《裝溪詩集》，知「裝溪」乃王萌之號。「疆圉大荒落」即康熙十六年(1677)，時王萌自稱為「叟」，兼以小傳謂其早年得見譚元春，則王萌生於明季無疑。進而言之，王萌於明末當已成年，入清後以遺民自居。其證有四：(一)《天門縣志》謂其入清後不求仕進，終身貧窶，與其他明遺民行徑類似；(二)《評註·自序》題於「疆圉大荒落」，不書年號。上圖、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本(下稱中科院本)及清華大學藏本猶有不避清聖祖諱之處，當為不奉新朝正朔之舉；(三)《評註·自序》稱引李贄、鍾惺二家之言，猶是明人習氣；若在清季，恐斥李、鍾為異端、詩妖不暇；(四)《湖北通志·藝文志》著錄《評註》，作者題曰「明王萌」，¹¹蓋王萌聲蹟於明社未屋前已聞於鄉里，後人尚知點滴，遂冠之於明代。設明亡時，王萌年二十，則其生年約在天啟四年(1624)。譚元春為王萌師長輩，其晚歲正當王萌之童年。

王萌卒年無考，然尚有線索可尋。《評註·天問》「咸播秬黍」節，王遠按云：「臆解如此，恨不及先伯父之存而質之。」(卷三，頁一三上)可知王遠作此按語時，王萌業已故去，則其卒年必早於上圖本之刊年。惜此本之確切刊年尚待考證。據《天門縣志·藝文志》所載，王萌除《評註》外，又有《易注解頤》六卷、《石鼓音義》一卷、《裝溪詩集》五卷，殆已不存。王萌受譚元春賞識，又稱引李贄、鍾惺，其

⁹ 清胡翼(修)、章鐵(纂)：《天門縣志》，民國十一年(1922)天門縣署據清乾隆三十年(1765)刻本石印，卷一七，頁七上。

¹⁰ 明王萌：《楚辭評註》，上海圖書館藏康熙刊本，〈自序〉，序頁二下。以下徵引此書時，隨文注明卷、頁，不另出注。

¹¹ 清楊承禧等(纂)、張仲炘等(修)：《湖北通志》，清宣統三年(1911)修、民國十年(1921)增刊本(上海：商務印書館影印，1934年)，頁3726。

文學思想蓋有師心說的淵源。既有《石鼓音義》等書，可見他於考據訓詁亦有涉獵。然其評註《楚辭》，則大率為論文之語。

王遠之名，見於《湖北通志·孝義附錄·天門縣》，¹²而《天門縣志》小傳則篇幅頗長：

王遠，字帶存，學有操持，不為威惕貨誘名動。博觀群書，必出其分際。於古人可悲可喜，往往設身其間，自証所進。品詣超上，初補武庠，棄之。高安朱相國軾尹潛江，入幕。潛有大小二莫案，制軍必辟大莫。高安義不誣人，遠為具草上書，與辯甚悉。制軍殺大莫，冤其事者頌朱，必及王。已贊胡克寬牧松江，理冤獄如神。行省尚書摠囚至，海寇庭下百人，皆坐辟。號曰：「幸付松江太守一平反，死亦可矣！」尚書以屬胡對獄，遠出聽屏後，皆得其情語。胡為申雪，遂全百口。比相國入政府，禮益隆。常以遠所著書晉御覽。相國諷曰：「先生盍仕？當為推轂。」遠力辭。雍正年間，詔舉賢良方正，大吏具徵書檄，有司敦促上道，全楚惟遠一人。遠又上書辭，且曰：「人非聖賢，四字不可當也。」晚年名益重，楊制軍宗仁、李學使周望皆以千金走使，將書幣迓謝，不赴。家居，祀先子弟肅肅聞。其告祖必自呼乳名，未嘗以老憊弛禮。卒之月，先剋死期，至日暝矣。悠然語其子曰：「安分為寶，永貽後人。」乃逝。¹³

玩方志之言，王遠年壽似近耄耋；而楊宗仁、李周望任職湖廣時，已值王遠晚年。考《湖北通志》，李周望於康熙五十二年(1713)任湖廣提學道，至康熙六十年轉職。¹⁴復考《清史稿》，楊宗仁於康熙六十一年(1722)就職，雍正三年(1725)卒於任上。¹⁵設王遠於雍正中葉(約1730)逝世，享壽八十；上溯生年，則約在順治七年(1650)左右。王萌為王遠伯父，較之年長二十餘歲，情理相當。王遠為人方正，為學博覽，然亦無意功名，鄉居甚久，僅兩度出任幕僚而已。據《清史稿》，朱軾於康熙三十三年(1694)成進士後授潛江知縣，至四十四年(1705)入京為刑部主事。¹⁶再據《松江府志》記載，胡克寬於康熙五十二年(1714)任松江知府，¹⁷此即王遠為幕僚之年代。中科院本《評註》扉頁題曰「朱可亭先生評選」，正

¹² 同上注。

¹³ 《天門縣志》，卷一五，頁七上至八下。

¹⁴ 《湖北通志》，頁2765-66。

¹⁵ 趙爾巽(主編)：《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頁7164-68。

¹⁶ 同上注，頁10243。

¹⁷ 清宋如林等(修)、孫星衍等(纂)：《松江府志》，清嘉慶二十二年(1817)刊本(臺北：成文出版社影印，1983年)，頁797。

文又為胡克寬(檢菴)校訂參評。朱軾、胡克寬參與《評註》的評選工作，必因王遠之關係；顧其以僚屬之身得兩任上司青睞，由此可窺見其才學品性。《天門縣志》既云朱軾「常以遠所著書晉御覽」，可見其著作不少。然據《縣志·藝文志》所載，僅得《家禮輯略》一種，蓋頗有亡佚。

《楚辭評註》版本及內容編次考述

《評註》一書，於康熙、乾隆間數度刊印。據饒宗頤《楚辭書錄》所記，《評註》有「康熙十六年丁巳刊本，日本西村碩園所藏」，又有乾隆二年(1737)鱸香居士(即《楚辭節注》作者姚培謙)刊本及乾隆三十五年(1770)致和堂刊本。¹⁸民初所編《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下稱《續四庫提要》)亦著錄乾隆三十五年致和堂刊本，然據「疆圉大荒落」字樣而謂《評註》成於乾隆二年丁巳，¹⁹則不確。姜亮夫《楚辭書目五種》著錄復旦大學藏鱸香居士乾隆三十五年初刊本，²⁰今不見。然姜氏謂復旦本為姚培謙初刊，有誤。《解題》又有乾隆四十四年(1779)三和堂刊本。²¹《提要》自饒氏《書錄》轉錄西村藏本後，復列有「康熙刊本」，似表示康熙時此書除了初刊尚有再版，唯年代不詳。²²此外，中、港、臺各種書目著錄此書者，甚或僅標為「清刻本」。²³

西村藏本現已難睹，然其與上圖本皆著為康熙十六年刊本，當是王萌〈自序〉題於康熙十六年之故。試觀上圖本：〈懷沙〉「玄文處幽」，「玄」字缺筆(卷四，頁一八下)；〈哀郢〉「曾不知夏之為丘兮」，「丘」字不嫌(同卷，頁一一下)；〈雲中君〉注引李賀詩「一泓海水杯中瀉」，「泓」字不避(卷二，頁三上)；刊印於康熙時無疑。但是此本中，王遠按語部份有引用林雲銘《楚辭燈》處(如卷一頁三下、卷三頁一六上等)。林書初刊於康熙三十六年(1697)，較王萌作序晚二十年。由此可知，上圖本之刊印年代絕非康熙十六年，而應在康熙三十六年《楚辭燈》梓後。筆者目下所查看的幾種康熙本與上圖本版式內容大率相同，皆非康熙十六年所刊。而所謂康熙十六年本的實物，至今未見。

¹⁸ 《楚辭書錄》，頁21。

¹⁹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濟南：齊魯書社，1996年)，頁19-497。

²⁰ 姜亮夫：《楚辭書目五種》(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頁171。

²¹ 《楚辭要籍解題》，頁112。

²² 《楚辭著作提要》，頁162。

²³ 如《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中文古籍書目》(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1983年)頁314所載即是。

不過，無論此書於康熙十六年是否付梓，有一點我們可以肯定：在這一年，此書第一稿已經完成。王萌〈自序〉題於康熙十六年，其評注工作畢於此時，自不待言。次者，上圖、中科院等本雖包含了王遠的考音和按語，但各卷首頁僅標「王遠攷音」，不言其按語之事，這與今日所見此書內容的實際情況不符。唯一可解釋的，就是康熙十六年的第一稿只有王萌評注和王遠考音兩部份，王遠的考音工作乃配合王萌評注而為。此稿完成多年後，王遠方又加入按語多條；康熙三十三年開始，王遠先後為朱軾、胡克寬幕僚，諸家評語遂亦增入；至康熙五十二年，即王遠出任胡克寬幕僚之後，第二稿方才完成，由王遠付於剞劂。此時王萌業已故去，故王遠於〈天問〉「咸播秬黍」之按語中稱王萌為「先伯父」。王遠按語與王萌意見時有不同，蓋王萌若仍在世，作為子侄輩的王遠當不會作此扞格之語。

上圖、中科院諸本皆據第二稿，然而上圖本並非王遠第一次刊行之本。考中科院本的正文版式、頁碼悉同於上圖本，北京出版社持以影印，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捌輯，著為「清刊本」。其扉頁右署「鱸香居士讀本」，則此本當刊於乾隆二年。中科院本內容儘管幾乎完全與上圖本一樣，然就其不同處而言：（一）聖祖名諱「玄」字，二本都有用原字者，亦有缺筆者，然缺筆字以上圖本為多；（二）中科院本有挖改而未補處，上圖本悉數補上。如〈天問〉「何闔而晦」下注文，中科院本挖去十二字，而上圖本則作「遠按此問與兒童之見何異屈」；²⁴（三）上圖本也校正了一些訛誤，如〈湘君〉題下，中科院本注：「而堯二女乃帝者之后，配靈神祇無緣，上降小水而為夫人也。」「上降」，上圖本作「下降」。²⁵〈少司命〉「與女遊兮九河」，中科院本注：「以曰：『此〈河伯〉章語也，當刪夫。』」「以」，上圖本作「洪」。²⁶〈懷沙〉「滔滔孟夏兮」，中科院本注：「沂沅如也。」上圖本作：「沂沅湘也。」²⁷由以上三點推想，上圖本應為中科院本的校訂再版。可是，上圖本刊印年代早於中科院本這個事實，卻與推想有矛盾。蓋王遠於康熙末年至少兩度刊印《評註》，首次本其後為中科院本所據，二次本即上圖本。乾隆二年，王遠當已去世。姚培謙既得王遠首次刊本，而不知此書曾改訂數次，遂據以翻印重刊。因此，《楚辭評註》的版本源流，初步可用下圖表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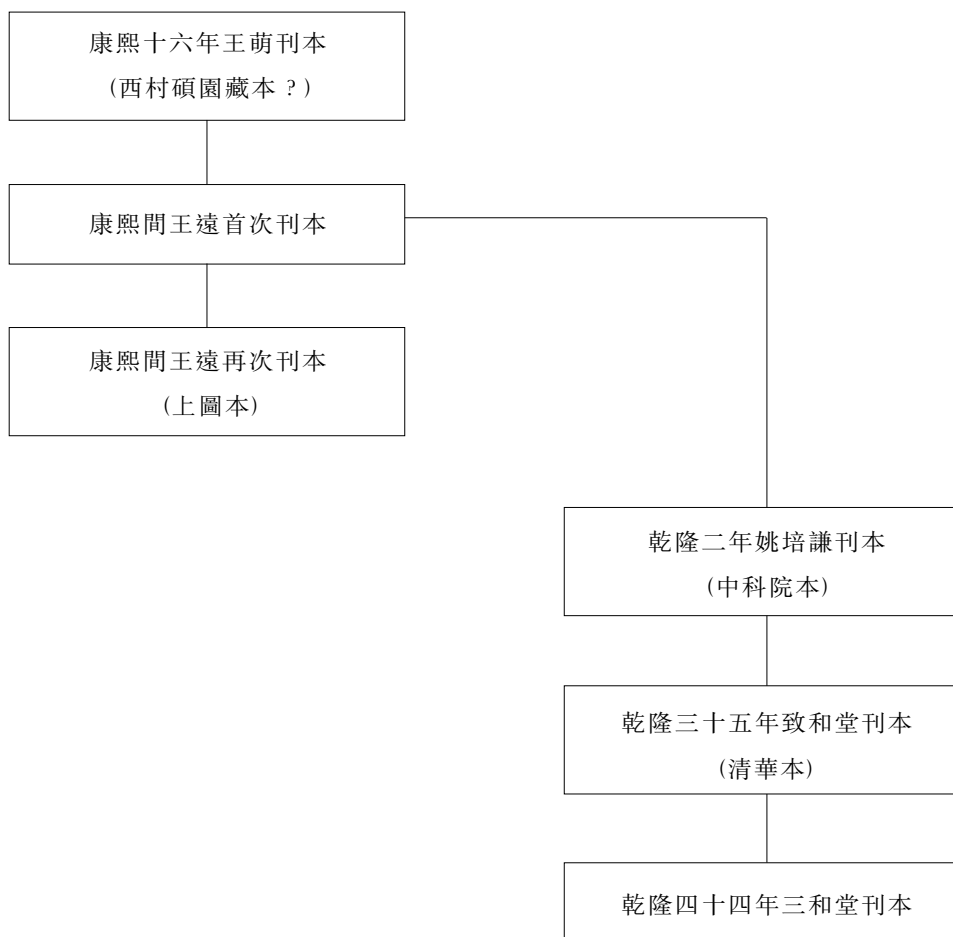
²⁴ 分見上圖本及中科院本卷三，頁四下。

²⁵ 分見上圖本及中科院本卷二，頁五下至六上。

²⁶ 分見上圖本及中科院本卷二，頁一一下。

²⁷ 分見上圖本及中科院本卷四，頁一七下。

圖一



上圖本扉頁已失。中科院本扉頁上署「高安朱可亭先生評選」，左署「竟陵王遜直先生注訂」，而右署「鱸香居士讀本」蓋為姚培謙重刊時所加。全書由王萌評註，王遠攷音、按語，朱軾、胡克寬、朱琦、唐建中、譚一豫參評。另參評者又有一「適菴」，姓名待考。首〈自序〉、次〈讀騷歌〉（此詩不見於中科院本）、次〈目錄〉、次〈目錄後記〉、次正文。正文十卷，共收錄〈離騷〉、〈九歌〉、〈天問〉、〈九章〉、〈遠遊〉、〈招魂〉、〈卜居〉、〈漁父〉、〈九辯〉、〈大招〉、〈惜誓〉、〈弔屈原〉、〈服賦〉、〈招隱士〉共十四題。其目錄編排，大抵係增刪朱子《集注》而來。現逐錄於下，並附以各卷校訂人氏，以資參考：

表二

卷次	篇題次第	題下小注	校訂者
卷一	離騷第一	近本諸家有經字	高安朱軾(可亭)
卷二	九歌第二		高安朱軾(可亭)
卷三	天問第三		荊門胡克寬(檢庵)
卷四	九章第四		族子价修(子向)
卷五	遠遊第五		雲間朱琦(柯亭)
卷六	招魂第六		同里唐建中(作人)
卷七	卜居第七		武林王元墀(笑升)
	漁父第八		
以上凡八題二十六篇			
卷八	九辯第九	宋玉 晁補之本此篇以下乃有傳字	後學譚一豫(崇教)
卷九	大招第十	景差	後學譚一豫(崇教)
卷十	惜誓第十	一闕名	繡水高宗濂(築堂)
	弔屈原篇十二		
	服賦第十三	二篇俱賈誼	
	招隱士第十四	淮南小山	
以上凡六題十四篇			

持王氏目錄與朱子目錄比對，知其變更處有五端：(一) 諸題上「離騷」、「續離騷」等字樣皆刪去；(二) 〈離騷〉刪「經」字，又改題下小注「《釋文》無經字」作「近本諸家有經字」；(三) 刪去〈九歌〉題下小注「一本此篇以下皆有傳字」；(四) 置〈招魂〉於〈遠遊〉之後，為卷六；〈卜居〉、〈漁父〉為卷七，其後卷目依次類推；(五) 刪去〈哀時命〉一篇。而沿襲處亦有四端：(一) 保持題次、卷次二者分列；(二) 保存題下小注；(三) 保存屈作與非屈作兩部份後之按語；(四) 保留目錄後記之體例。然朱子〈目錄後記〉，實全書之自序；而王氏〈目錄後記〉則主要討論篇章去取問題，對於各篇篇名、作者的說法，並未作太多的考證，主要是根據文章詞氣提出一己之取捨標準。²⁸

²⁸ 《楚辭評註·目錄後記》云：「按〈離騷〉下，《釋文》及《史記》俱無經字，當仍之。〈九章〉、〈遠遊〉，或謂辭人擬作，非是。〈招魂〉，王逸諸本俱謂宋玉作，遷史以為原作，劉勰論亦同，玩其詞氣良是，今繫之屈原。〈九辯〉、〈大招〉或謂俱原作，非是。〈惜
〔下轉頁322〕

王萌的楚辭學特色

著述動機

清代以前的學者論《楚辭》，往往失之偏頗。褒尊者想將《楚辭》提升到儒家義理的高度，貶抑者則直以奇技淫巧、玩物喪志詆之。晚明許學夷曰：「屈原之忠，忠而過，乃千古定論。今但以其辭之工也，而謂其無偏無過，欲強躋之於大聖中和之域，後世其孰信之？此不足以揚原，適足以累己耳。」²⁹ 同樣是站在儒家的立場，卻提出較為接近事實的意見，明白儒家思想不能規限屈子。王萌對於屈子的看法與許學夷相似：「屈子古狷者流，其志行必則彭咸，本不必有合大中之行。然屈子意未嘗自諱也。」(卷七，頁五上) 指出屈子為狷者，其思想行事與儒家中庸之道不必有合是理所當然。此看法頗為接近事實，可見他深切了解屈子的生平思想。不過，《評註》一書的寫作，並非徒為注《騷》而注《騷》。以下分兩目論之。

追求立名之道

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³⁰ 儒者對於身後之名是非常看重的。如何建立名聲？《左傳》謂有「三不朽」：「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³¹ 而古代社會，又以通過科舉而仕進、建立功業為立名的主要途徑。歷來仕途不得意者，往往以屈子見放自況。明蔣之翹〈哀屈原文〉云：「蔣生既放，見昔人有蒙讒而抑鬱者，必咨嗟太息，拔劍擊柱。……一夕檢得《離騷》，載涕載讀數過，乃奉其書於几上，列籩豆菹醢，舉觴灌酒漿，再拜而泣。」³² 以明代而言，桑悅、張之象、何喬遠、蔣之翹、陸時雍等人研究《楚辭》的原因，都不離此。竟陵派領袖鍾

〔上接頁321〕

誓》，王逸以來謂賈誼作，亦無明據，其不載〈弔屈原〉、〈鵬鳥〉二賦，亦非王本。又有東方朔〈七諫〉、王褒〈九懷〉、劉向〈九歎〉及逸所作〈九思〉，晦翁謂詞氣平緩，無病呻吟，不當以累篇帙，俱刪去。又按莊忌〈哀時命〉，填寫成語太多，余亦刪去，卷中共四十二篇。」(目錄頁二上)

²⁹ 明許學夷：《詩源辯體》(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頁34。

³⁰ 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論語注疏》，清嘉慶二十年(1815)南昌府學刊阮元《十三經注疏》本(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1985年)，頁140。

³¹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左傳正義》，《十三經注疏》本，頁608。

³² 明蔣之翹：〈哀屈原文〉，載蔣之翹(編)：《七十二家評楚辭》，明天啟五年(1625)刊本卷首，頁一上至一下。

惺，也自稱「深好屈原而悲其遇」。然而，王萌認為屈子之偉大在於立德，如其評注〈大司命〉「愁人兮奈何」一節時云：

章首曰「何壽夭兮在予」，繼曰「眾莫知兮余所為」，以影言命非人所能為也。卒乃正言之，而先矢之以無虧，《魯論》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莊子》曰：「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安命而後可以守死，守死而後可以立名。懷沙之人，胸中本領固不同矣。（卷二，頁一〇下）

屈子胸中與眾不同的本領，就是「守死」。守死不僅是盲目接受那人力不可改變的命運，而是了解自己的個性，堅守自己的宗旨，如此便是立德，便是順應天命。因此，王萌覺得鄉先賢鍾惺對於屈子之不遇依然斤斤計較，其實跟揚雄的〈反離騷〉大意相同，並非篤論。屈子這套本領「鬱為幽思，抒為真怨」（序頁二下），化成《楚辭》作品；由立德而立言，而其忠名便隨《楚辭》而不朽了。對於自己的不遇，王萌未嘗不有感於心。然而他覺得，與其和姦邪之人共事，不如潔身遠逝：「薺不同荼，遠其苦也；幽蘭空谷，守其獨也。物理且然，人可悟矣。」（卷四，頁三〇下）通過這番詮釋，可知其本人雖然終生不遇，卻並未因此自憐。王萌之注《騷》，與他所認知的屈子作《騷》之意，其揆一也。他要通過《評註》一書而留名於簡冊之上。

寄託亡國之思

由於屈子在楚社將墟之際大聲疾呼，欲挽狂瀾，故明代遺民對《楚辭》大都抱有特殊的感情。明代中葉，前七子領袖何景明論《楚辭》時，曾提及發生在靖難之變時的一段軼事：「遜國臣有雪庵和尚者，好觀《楚辭》，時時買《楚辭》，袖之登小舟，急棹灘中流，朗誦一葉，輒投一葉於水，投已輒哭，未已又讀，終卷乃已，眾莫測其云何。嗚呼！若此人者，其心有與屈大夫同抱隱痛者矣！」³³雪庵和尚原為惠帝之臣，不願侍奉篡位的成祖而剃度為僧，此事在明代流播甚廣。明末清初之時，盧之頤師嚴氏聞國變後，命盧刊印《楚辭章句》，以效雪庵和尚亡國之思。³⁴王萌於明代毫無功名，入清後以遺民自居。他對於《楚辭》的共鳴，是可想而知的。其自謂「窮老讀《騷》，終日不厭」，當非大言欺人。《評註·自序》云：「夫屈子宗臣，而值夏屋之將丘。……寧能碌碌默默，苟以為厚道也？」（序頁一上）《評註》固為王萌之讀《騷》心得，然更寄託了故國黍離的悲哀。進而言之，王萌贊成屈子不「苟

³³ 同上注，〈楚辭總評〉，總評，頁九上至九下。

³⁴ 明盧之頤：〈楚辭引〉，載崔富章：《楚辭書目五種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頁33-34。

以為厚道」，實深有感觸之言。他比核〈惜往日〉「惜靡君之不昭」、「惜靡君之不識」二句，注云：

一曰惜靡君之不昭，再曰惜靡君之不識，惓惓欲以一死明讒人之罪，獲冀與之並命，亦未可知也。此法用於英主之世，未為失計。漢張湯自殺，而三長史皆案誅，以有武帝在上也。原死而上官靳尚之屬不聞得罪，汨羅之沉，為無益矣。然千載而下，讀《騷》者輒代為切齒，恨不起若輩於泉下而手誅之。忠良之死，故讒諛之極刑也。（卷四，頁二八上）

所謂聖主賢臣，自古不偶。王萌對讒佞當道、屈子自決表達了極大的哀憤。他甚至把矛頭直指帝王，認為屈子沉水，固然是以死明志；但沒有英主在上，死亦徒然。又〈懷沙〉「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注云：「重車陷於泥濘，言時之當國者僨事也。」（卷四，頁一九上）對於昏君讒臣之誤國，也深有不滿。明思宗雖非庸主，然剛愎自用，猜忌成性，在位十七年間首輔更換五十餘次，中清太宗之計而殺袁崇煥。另一方面，東林黨爭終明之世未嘗稍息，不斷的攻訐傾軋直接斷喪明王朝的生機。王萌親歷明亡之痛，不可能不嘔唏感歎。從「起讒諛於泉下而手誅之」一類的過激言辭可知，王萌晚年注《騷》時回想明末，仍有餘慨，遂形之於筆。

對〈天問〉所記湯武征伐之事，明末清初學者每有感觸。如周拱辰《離騷草木史》眉批：「商周之際，真堪痛哭。」³⁵王萌注〈天問〉至此處，亦有類近之語。如「伯昌號衰」節注：「言文王奉紂命為西伯，號令于殷衰之時，秉鞭笞，作牧伯，率殷之叛國以事紂。」（卷三，頁二二下）謂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則文王之居心亦可知矣。又「列擊紂躬」節注：「言周公既不喜擊紂，何為又教武王使定周命乎？」（同卷，頁二〇上）周公協佐武王伐紂，在王萌看來也非常可議。

評註方法

在〈自序〉中，王萌說明注《騷》之法道：

一切注疏，束而不觀，反覆吟詠。偶有所通，即筆之於下，不敢以鑿說戾之，不敢以迂解滯之。雖未知於屈子之意何如，大約二者諒亦湘纍之所許也。已而取柳子厚〈天對〉與〈天問〉並讀，時有發明。又取叔師、晦翁及洪氏注，錄其安穩確然不可易者，綴於各篇之下。（序頁一上）

³⁵ 明周拱辰：《離騷草木史》，上海圖書館藏清嘉慶六年癸亥（1803）聖雨齋刊本，卷三，頁五二下。

正如《提要》所言，此法並非王萌所獨秉，清人解《騷》，許多亦如此。³⁶ 然而，從明末清初的學術風氣來考察，王萌之語並非無的放矢。所謂「迂解」，指那些道學家援屈入儒之論，如劉永澄的《離騷經纂注》。³⁷ 所謂「鑿說」，指師心說者隨性矢口之詞，如李贄論漁父是否實有其人，意見搖擺不定。³⁸ 要求屈子之心，必須叩其兩端而折衷之。王萌注《騷》時非常著重文本分析。他將舊注「束而不觀」，先靠反覆吟詠來探討，從這種方法中不難看出竟陵派師心說的影響。故《續四庫提要》論《評註》云：「詞旨淺近，語多簡質，仍不免拘於騷人比興之體，而失之穿鑿。」³⁹ 實亦承清人之見。不過這只是第一個步驟。為了避免游談無根，仍需參詳《章句》、《補注》、《集注》三種權威舊注；至於〈天問〉一篇，更要取柳宗元的〈天對〉合讀，才能有所創見。總而言之，王萌的評注方法可以分為評文和注解兩部份，評文是詞章賞析，注解則是字詞訓釋，現分而論之。

評文

明代以還，評點之學大盛。評點文字的內容非常繁雜，但其典型者多是一些以感性筆調寫成的閱讀心得。這些文字未必有益於義理、考據，但在詞章上能幫助讀者對文字的理解，如《提要》所言，具有藝術欣賞的成份。《評註》一書並沒有圈點、眉批、夾批、總評，但評點性質的文字卻為數不少。如〈湘君〉「桂櫂兮蘭枻，鑿冰兮積雪」二句，評註云：「其櫂也桂，其枻也蘭，水擊有似鑿冰，水揚有似積雪，示芳示潔，寓意良妙。」（卷二，頁四下）〈九辯〉「年洋洋以日往兮」一節，評註云：「全是遲暮之感，不言怨而怨益深矣。」（卷八，頁八下）短短數語，雖然感性成份甚重，卻能將篇章的神理點撥出來。

³⁶ 《楚辭著作提要》，頁158。

³⁷ 如劉永澄解〈離騷〉「哀民生之多艱」章云：「朝諛夕替，正民生多艱處。君子安其身而後動，何樂乎一鳴輒斥？然其勢有必不相容者，則謇謇之為害也。蓋世間君子有兩種：有一種煬和之君子，從容諷議，猶可需以歲月；有一種婞直之君子，鋒芒勁峭，必難待之一朝。秦檜謂張九成曰：『立朝須優遊委曲。』果其優遊委曲耶？庶幾免乎，然而無所不至矣。三代以下，黜之黷何如孫弘之尊顯？雲之直何如張禹之親信？其人甘則其遇亦甘，其人苦則其遇亦苦，理勢然也。故坎壈跋扈，非君子之不幸。不容然後見君子，一言自是破的耳。若無災無難，坐取公卿，不問而知其匪人矣。千古巧宦衣鉢，都自秦檜傳來。」見明劉永澄（撰）、清劉寶楠（手批）：《離騷經纂注》，上海圖書館藏萬曆間興讓堂刊本，頁一三下至一四上。雖稱詳盡，然頗為迂遠。

³⁸ 明李贄：《焚書》（臺北：河洛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74年），〈漁父〉，頁200。

³⁹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頁19-498。

除了感性評點外，王萌析論各篇章的文風，時時以小見大，有獨到的分析。〈九辯〉「計專專之不可化兮」一節，評注云：「繾綣低徊，深得屈子之意。不敢怨天，而反曰賴天，立言柔厚如此。」(卷八，頁一二下)讀者由此不僅可以掌握〈九辯〉的筆觸，更可勾勒出作者宋玉的性格與精神。〈離騷〉為屈子的代表作，《楚辭》的其他篇章在精神、感情、筆法上與此篇有各種關聯。王萌從筆法入手，對這些隱藏的關聯作出了一些爬梳。如〈離騷〉中「巫咸夕降」一段，王萌指出：「巫咸教以遠去，上下周流，無境不歷，而卒歸于懷其故都，文字詰曲盤旋，馳驟往復，真曠世驚才也。〈遠遊〉及〈九辯〉末章皆如此命意。」(卷一，頁一四上)認為〈遠遊〉、〈九辯〉的筆法都直承於〈離騷〉。

王萌析論文法，主要在於句法、字法，通過分析句式的構造以及遣詞的方式來闡發《楚辭》的藝術技巧。句法方面，如〈離騷〉「麾蛟龍以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予」，王萌云：「二句亦倒裝，言詔西皇使蛟龍為梁也。」(卷一，頁二五下)〈湘君〉「薜荔拍兮蕙綢」，評注云：「薜荔言拍，蕙言綢，互文耳。」(卷二，頁四上)所論多為此類。字法方面，正如洪湛侯所言，王萌能用互證的方法，加深對作品的理解，成就突出。⁴⁰其解〈離騷〉中「眾芳」一詞云：「篇中凡三言眾芳：曰『眾芳之所在』，小芳依大芳，以顯明穆之道也。曰『哀眾芳之蕪穢』、曰『苟得列乎眾芳』，大芳溷小芳，以沒昏亂之道也。」(卷一，頁三下)大芳指蘭、蕙等賢人，小芳指揭車、江離等眾人。「眾芳所在」，是因為有大芳的領導；「眾芳蕪穢」，則係小芳悉皆變節，迫使大芳不得不從俗。這種方法並非從訓詁入手，而是通過詞章文理的分析以得到較熨貼的解釋。再觀「折瓊枝以為羞兮，精瓊靡以為芳」二句之評注：「瓊枝瓊靡，並不言蘭蕙矣。蘭所同也，瓊所獨也。紉蘭其始也，瓊佩其終也。屈子固不肯苟列於一切矣。」(同卷，頁二四下)屈子目睹眾芳蕪穢，唯有瓊佩不會凋萎，最後不得不獨倚瓊佩，以示節概。此論體現出王萌的細心之處。

此外，王萌在評注時也常常援引外證。這些外證的功能有二：一助賞析，二資注解。就第一端而言，如〈湘夫人〉「聞佳人兮召予」句，評注云：「本無聞而如聞其召，以幻為確，與《詩·皇矣》『帝謂文王』同一思理。」(卷二，頁七下)「帝謂文王」固為詩人虛擬。王萌持之以比〈湘夫人〉，令讀者更深入理解辭中那種疑幻疑真的縹緲境界。〈招魂〉「湛湛江水兮上有楓，魂兮歸來哀江南」，評注云：「楓木……至霜後葉丹可愛，故騷人多稱之。……同一楓也，少陵『玉露凋傷』，寄興于秋，屈子『湛湛江水』，寄興于春。古之傷心人，任舉一物，皆有濺淚驚心之感，難與俗子道也。」(卷六，頁一〇下)文筆頗得鍾、譚遺風，別有致趣。

⁴⁰ 《楚辭要籍解題》，頁112。

注 解

在注解上，王萌比較審慎，即便遇到難解之處，也「存而質之」，不強作解事。由於以紹述舊說為主，一己獨見不甚多，與評文相比，可謂遜色。儘管如此，王萌的注解也有可取者，如「偃蹇」一詞，在《楚辭》中出現過數次，〈離騷〉「望瑤臺之偃蹇兮」，王逸注：「偃蹇，高貌。」朱子從之。⁴¹王萌云：「凡言偃蹇，皆有高踞之意。蹇者，移步其而必仰，偃蹇之義也。」(卷一，頁一七下)「何瓊佩之偃蹇兮」，王逸注：「眾盛貌。」朱子從之。⁴²王萌云：「蘭佩柔弱如俯，瓊佩森挺如仰，故曰偃蹇。」(同卷，頁二二上)〈東皇太一〉「靈偃蹇兮姣服」，王逸注：「偃蹇，舞貌。」洪補：「偃蹇，委曲貌。一曰眾盛貌。」朱注：「偃蹇，美貌。」⁴³王萌云：「神靈居高而容仰，故曰偃蹇，尊嚴之貌也。」(卷二，頁二上)釋「偃蹇」一詞，緊守「高踞」之意，不作他想，其說甚為圓融。

舊注未及者，王萌也有所剖析。〈抽思〉「與美人之抽思兮」與〈惜往日〉「焉舒情而抽信兮」，二句皆用「抽」字，王萌注云：「繹之而不窮者，思也。故上曰抽思。引之而如一者，信也。故此曰抽信。」(卷四，頁二六上)解釋「抽」字為何可以用於「思」、「信」二字之前，很是完善。

抑有進者，王萌注《騷》，經常援引外證。前文已言，這些外證一助賞析，二資注解。就第二端而論，〈離騷〉「恐美人之遲暮」句，王萌提出：「以美人稱君，本《詩·簡兮》卒章，其曰：『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駘蕩多姿，此騷胎也。親而媚之，故目以美人；尊而嘉之，故目以靈脩。」(卷一，頁三上)點出「美人」一詞的來源與用法。明人陳沂同樣注意到〈簡兮〉卒章「山有榛，隰有苓」二句，認為是〈湘夫人〉「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所由自。⁴⁴然而他卻忽略了後面的「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詩三百》中的「兮」字句固然不少，但切近於《楚辭》「駘蕩多姿」的風致者，當首推這兩句。王萌究《詩》、《騷》文心，稱這兩句為「騷胎」，可謂至評。王萌留心於《易》，有《易注解頤》，亦用《易》解《騷》。〈九辯〉「皇天淫溢而秋霖兮」二句，朱注：「眾人皆蒙君澤，而我獨不霑。」⁴⁵《評註》云：「況君澤之橫施也。《易》屯膏非九五所宜，然亦有小貞吉之文。」(卷八，頁五上)〈屯·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引《易》指出楚王濫賞的不當。

⁴¹ 漢王逸(章句)、宋洪興祖(補注)：《楚辭補注》(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頁32；宋朱熹：《楚辭集注》(臺北：文津出版社，1987年)，頁18。

⁴² 《楚辭補注》，頁40；《楚辭集注》，頁22。

⁴³ 《楚辭補注》，頁56；《楚辭集注》，頁22。

⁴⁴ 明陳沂：《拘虛詩譚》，收入吳文治(主編)：《明詩話全編》(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頁1943。

⁴⁵ 《楚辭集注》，頁123。

《評註》雖然主要參照《集注》，然對於朱子的一些論說卻並不盲從，這在王萌的一些注解中可以見到，如〈離騷〉「既替余以蕙纒兮」節，朱注：「申，重也。此言君之廢我，以蕙芷為賜而遣之。」⁴⁶將「替蕙」、「攬芷」全部解成楚王宣示決裂之意。王萌不同意此解：「言我雖以修姱見替，而猶攬芳以自結束，故曰又申之也。晦翁解未安。」(卷一，頁七下)更為平實貼近。〈少司命〉「夫人兮自有美子，蓀何以兮愁苦」，朱注：「蓀，猶汝也，蓋為巫之自汝也。」⁴⁷王萌云：「言其不與己合，何為以我而愁苦也？朱謂巫自稱，非是。」(卷二，頁一一上)玩味原文，若將此兩句解作巫師向少司命陳述之語，情致更永。

《楚辭》流傳日久，訛誤難免。洪興祖《補注》業已羅致各種異文。王萌於校讎並不在意，但因注解的需要，亦偶有論及者。〈天問〉「吳獲迄古」一節，王逸解作太伯、仲雍讓國之事，然「迄古」二字甚為費解。⁴⁸王萌云：「迄當作逃，言伯逃古公也。」(卷三，頁一六上)若能進一步提出證據，當更有可取。此外，王萌注《騷》，非僅一味尚雅，同時也援據俗語為證，如〈山鬼〉「歲既晏兮孰華予」句，評注云：「華予，猶俗所謂光寵也。」(卷二，頁一六上)

王遠的楚辭學特色

《評註》十卷，每卷卷首皆題「王遠攷音」。綜觀全書所收正文六百一節，其下大都綴有王遠的考音文字，而有王遠按語者則共二百六十四節。由於時代和學術風氣的變化，王遠的學術好尚及其對《楚辭》的見解已與乃伯頗有不同之處。因此在刊印乃伯著作時，王遠以按語的方式增入己見。王萌的評注主要著眼於詞章賞析，這一點得到王遠按語的繼承發揮，故洪湛侯謂按語「涉及對《楚辭》藝術技巧方面的評價」。⁴⁹再者，王萌評注雖善疏通字句，但其風格偏向穩健，於篇章大義闡發有限；相形之下，王遠按語多有探求篇章大義之處，個人寄託之語也較王萌為少。義理的闡發，往往會流於附會。這一點，王遠自己也有認識。因此他說「臆解如此，恨不及先伯父之存而質之」。不過，王遠本身的學殖較為豐厚，加上大膽假設的風格，因此其按語中往往閃爍著靈光，這和王萌的平實穩健頗為不同。

⁴⁶ 同上注，頁8。

⁴⁷ 同上注，頁39。

⁴⁸ 《楚辭補注》，頁105。

⁴⁹ 《楚辭要籍解題》，頁112。

王遠按語的義理發揮及其時代背景

王萌身經明清鼎革，故在評注〈天問〉湯武征伐的文字時頗有感觸。他說：「文王奉紂命為西伯，號令于殷衰之時，秉鞭笞，作牧伯，率殷之叛國以事紂。」又謂：「周公既不喜擊紂，何為又教武王使定周命乎？」對於衰亡的殷商似乎還有留戀之處。對於這些文字，王遠也有按語，但察其語氣，則與王萌不同。如〈天問〉稱伊尹為「小臣」，又曰「小子」。王遠按云：「若深惡之。屈子於君臣放伐之際，蓋不勝忿矣。」(卷三，頁一九上)「會鼂爭盟」節，按道：「言盟津之會八百，甲子之朝畢集，蓋必有期之者；將帥之勇，師旅之眾，蓋必有萃之者。曰何踐，曰孰使，深為不滿之詞。掃盡應天順人等語。」(同卷，頁一九下)又「彼王紂之躬」節按：「惡桀紂所以亡國，然亦不寬湯武。」(同卷，頁二一下)驟而觀之，似乎將桀紂、湯武各打五十大板。但玩其辭氣，王遠之語與乃伯相比，不帶一絲感情色彩。他所貶斥的固然包括昏君，但更在於亂臣賊子。這樣的言論，與康熙以後君權強化的背景殆不無關係。

王遠身處的時代，清廷的統治已相對穩定。故王遠雖無功名在身，其思想比起乃伯更加傾向儒家，這在他發揮《楚辭》義理之際不時可見。如夏禹與塗山氏的結合，歷來不無可議。〈天問〉所謂「胡為嗜不同味，而快鼂飽」，王逸解曰：「何特與眾人同嗜欲，苟欲飽快一朝之情乎？」⁵⁰今人金開誠也論道：「屈原並沒有否定禹繼鯀治水之功，卻懷疑他作為聖君為甚麼苟合成婚。」⁵¹而王遠按道：「胡為辛壬癸甲四日便往治水，何其嗜好不與人同，如彼飲食，人甘其味，而禹止快朝飽乎？」(卷三，頁一〇上)如此一說，反進一步呈現了夏禹捨身為民、大公無私之風。這無疑是站在儒者的立場，歌頌聖君先王。可是，前文「焉得彼塗山女，而通之於台桑」二句，王遠卻闕而不解，可見其立論並不踏實。

王遠的文學素養甚深，因此他對某些篇章大義的闡釋也有其獨到之處，例如〈禮魂〉篇「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王萌注云：「春祠以蘭，秋祠以菊，即所傳之芭也。」將蘭、菊和「傳芭代舞」的「芭」扣上關係。解釋固然通融，卻仍是就文理而言。王遠按語則謂：「言二時之祭必薦馨也。無絕終古，言魂得長享之也。屈子蓋憂楚之不祀，而致意于篇終如此。」(卷二，頁一八下)將此篇的內涵更提昇了一個層次。〈天問〉「永遏在羽山」、「纂就前緒」二節，都是就鯀禹之事來發問。王遠按云：「以幹蠱之事望之頃襄也。……言禹纂鯀之緒而能成功者，惟厥謀之不同也。望頃襄正在此。」(卷三，頁五下)認為屈子道及鯀禹，就是為了提醒頃襄王要繼承父業，為父報仇。

⁵⁰ 《楚辭補註》，頁97-98。

⁵¹ 金開誠：《屈原辭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頁227。

王遠的詞章賞析

由於王遠關於詞章的論述皆用按語形式出之，因此所言大抵是以王萌評注為參照，從而作出補充、牽合以至於駁正。王萌好言字法、句法，好作評點之語，王遠的論述方式亦有相近處。為免冗沓，此處不復贅言。進而言之，王遠更著重從整體來析《楚辭》之義，故考求主旨、析探章法兩者是王遠賞析詞章的核心工作。

考求主旨

析論詞章，王萌多以疏通文句為主，王遠進而考求一篇主旨。如〈雲中君〉篇，朱子謂第一節「浴蘭湯兮沐芳」描寫巫女降神，第二節「審將憺兮壽宮」描寫神至之景，第三節「靈皇皇兮既降」為雲神離去之狀。⁵² 王萌注幾乎全部取自舊註，甚為簡略，對於主旨、章法也無論述，蓋亦以祭祀樂曲一概視之。王遠則能把握此篇特點而總括道：「此篇全是頌雲，未言主祭迎神之禮。」(卷二，頁二下) 他的理據是：「英，花英。言五采之衣，鮮明若華之英，寫雲之色。連蜷，長曲貌，寫雲之態。」(同頁) 又按第二節道：「雲無定在，望其降而安於此也。雲能蔽日月，有時得日月而益絢爛，日月齊光，善於頌雲。雲從龍，故曰龍駕。帝服彰施五采，故曰帝服。翺遊周章，言其將下降也。二章總是言雲中君衣服容貌之美、性情之變動也。」(同卷，頁三上) 所論可謂深得宛曲。這樣的論述也許有損此篇的情節起伏，但一、二節合解，則全成賦體，描寫雲之狀貌，酣暢淋漓。

又如〈天問〉篇，王逸已經論道，屈原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及古聖賢行事，因書其壁，呵而問之，故其文義不次序。⁵³ 所謂「文義不次序」，王萌以為主要是「有一人而前後錯舉以問者」，乃因「人事」這段而言(卷三，頁一上至一下)，而王遠的解釋則是：「曰書其壁而問之，不必實有其事，而奇情至理，如或見之，非叔師無此妙解。或議其非者，癡人也。通篇多故為癡語，不可以恆理求。蓋思君之至無所發，憤而為此也。」(同卷，頁一下) 認為王逸之說固妙，卻有坐死之嫌；屈子心情既然哀憤膺亂，文義不次序可以想像。與王萌同代的李陳玉謂〈天問〉言天、地、人的脈絡非常清楚，⁵⁴ 而王遠認為天、地

⁵² 《楚辭集註》，頁31-32。

⁵³ 《楚辭補註》，頁85。

⁵⁴ 明李陳玉云：「〈天問〉當分作三大段：自『遂古之初』起至『囉靈安藏』止，為上段，共四十四句，是問天上事許多不可解處。自『不任汨鴻』至『烏焉解羽』止，共六十八句，為中一段，是問地上事許多不可解處。自『禹之力獻功』起至末『忠名彌彰』止，共二百六十一句，為後一段，是問人間事許多不可解處。」見《楚詞箋注》，復旦大學圖書館藏康熙十一年(1672)刊本，卷二，頁二下至三上。

兩段都是人事一段的鋪墊：「蓋欲問人事種種，故先為迂遠之言也。」(同卷，頁二下)然而，即便說道人事，屈子也時時施以欲擒故縱之法，如「桀伐蒙山」一節，王遠按道：「言伐蒙山何所得？得一妹嬉，以自亡國耳。冷語自妙。又言妹嬉亦未大肆其惡，湯何以遽興兵端乎？又故作駭語也。」(同卷，頁一五上)認為屈子是在用一種不同於傳統的角度來體認商湯革命這一歷史事件，因此人世不合理處更加突顯出來。直到「天命反側」節，方按云：「以前多作駭語，似欲歸咎于天，至此乃作正論，歎天命之無常，實由人事之臧否，天何嘗有意罰之、有意佑之乎？」(同卷，頁二一下)如此解說，不但使〈天問〉一篇大義昭明，其章法也一目了然。

析探章法

章法的析探，在王遠按語中比比皆是。王萌好言字法、句法，以故王遠更著眼於章法。如他因〈湘夫人〉首章而比較二〈湘〉道：「此亦神未來而想望之，與〈湘君〉首章微別而實同。前言不行，此偏言降，其實北渚之降，止是懸空摹擬，與中洲之留無異也。『目眇眇』，屬己既擬其降，遂含睇而遠望之也。前篇『願無波安流』所以遲夫君之來，此以『木落風生』知帝子之不降，意同而文法變換如此。」(卷二，頁六上)二〈湘〉是二神贈答之詞抑世人祭祀之詞，古無定說，而王遠取後者。他認為二神終篇皆未降靈，故云篇旨相同。本於相同的篇旨，再細細比較章法，於是曲得其妙。又〈遠遊〉「指炎神而直馳兮」節之前，已經暢言東、西、北三方的遊歷。王遠仔細揆察文義而按云：「上三方皆在天上，此則仍在地下矣。蓋故鄉也。」(卷五，頁八下)指出前三方的天際翱翔，正是為了烘托出下文故鄉楚國的倍加可愛。

可是，《評註》所收的四十篇作品，王遠並未一一析探章法，而且某些篇章的分析也失之粗略。以〈離騷〉為例，王遠雖亦提及某段某段，但事實上並未明確地為〈離騷〉分段。像「靈氛告余以吉占兮」以下的那一大截文字，也沒有隻字片言提及。這種情況在其他篇章中也復如此，因此可以斷言，王遠的章法之論雖有創獲，一定程度上也補充了王萌的不足，但猶未盡善。

王遠的考據工作

與王萌不同，王遠楚辭學的內容有更多的考據學成份。王萌評注，王遠考音，固是分工；但觀書中除王遠以外，幾乎無人論及聲韻，可見王遠的學術興趣與眾人相異。自明代楊慎開始，學者逐漸重視楚辭聲韻學。然而，清初坊間流行的《楚辭》本子中，關涉聲韻學處似乎有限。《評註》所徵引的陸時雍《楚辭疏》、黃文煥《楚辭聽直》、周拱辰《離騷草木史》、林雲銘《楚辭燈》等書，都以論文為主。正如姜亮夫論《楚辭燈》，謂「完全以文章次序作基礎來研究《楚辭》，重於疏通文義而略於訓

詰」，「對音韻、訓詁、歷史等注釋較隨便」。⁵⁵ 因此，王遠考音獨見雖然不多，但他能夠徵引吳棫、楊慎、顧炎武等人之說以解《楚辭》，在考據學尚未興盛的清初，是有其學術意義的。下文會分別論述其在訓詁、聲韻上的得失。

訓 詁

王遠在論評《楚辭》的詞章時，比較注重援引內、外證，也不時作出一些新穎的推測，這樣的方法同樣用於訓詁。

在引用內證方面，王遠善於通過揣度他篇的文義來解釋問題，如〈離騷〉「反信讒而齋怒」，按云：「齋怒，猶言釀怒，〈抽思〉所謂『造怒』也。」（卷一，頁四下）洪興祖引《說文》曰：「齋，炊舖疾也。」⁵⁶ 「炊舖」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所以王遠把「齋怒」釋為「釀怒」，並舉〈抽思〉的「造怒」為佐證。又〈惜誓〉「臨中國之眾人兮」，按云：「中國謂楚國之中，即『臨睨舊鄉』之意。」（卷一〇，頁三上）皆其類也。

再看外證。關於《楚辭》中第一人稱代名詞的用法，王遠按〈大司命〉「紛吾乘兮玄雲」句道：「《楚辭》『余』字、『吾』字多有代人稱者。《補》引漢樂歌云『靈之車，結玄雲』是也。」（卷二，頁九上）除參考洪興祖的意見外，復引用《古文尚書》加以論述。〈離騷〉「孰云察余之中情」、「夫何斃獨而不予聽」二句，按云：「此亦女嬃之言，上『余』字代原稱，下『予』字嬖自予也。今人口頭時有此等稱謂。又《尚書·五子之歌》『萬姓仇予』，『予』指太康；『鬱陶乎予心』，『予』字乃自予。與此一例。」（卷一，頁一一上）對「余」、「予」自謂、他謂的用法分析，大意粲然。再如〈惜誦〉中「仇」、「讎」二字，朱子僅簡單注云，「怨耦曰仇」，「讎，謂怨之當報者」。⁵⁷ 王遠則引述《爾雅》以申析道：「仇讎微有深淺。《爾雅》：『仇仇敖敖，傲也。』讎有必報之義。」（卷四，頁二下）

從王遠對「仇」、「讎」之義的注解，可知他對於一些舊說常常斟酌損益，擇善而從。再如〈招魂〉「像陳君室」句，《章句》云：「像，法也。」《集注》則云：「像，蓋楚俗，人死則設其形貌於室而祠之也。」⁵⁸ 朱子既言「蓋」，知其僅為推測。王遠按道：「朱子解非不佳，但古未必有畫像事，且下文俱造作第室事也。」（卷六，頁五上）從古俗和文理兩端支持王逸的論述。

對於明人的論點，王遠也有採用。〈離騷〉「夏康娛以自縱」一句，按云：「舊注謂夏康為太康，然『康』、『娛』二字下皆連用，『夏』字少住亦可。」（卷一，頁一一

⁵⁵ 姜亮夫、姜昆武：《屈原與楚辭》（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頁123-24。

⁵⁶ 《楚辭補注》，頁9。

⁵⁷ 《楚辭集注》，頁75。

⁵⁸ 《楚辭補注》，頁202；《楚辭集注》，頁137。

下)此說本自汪瑗《楚辭集解》，實較王、朱之解為佳。而近代、同代《楚辭》注家於訓詁雖然留心不足，然若有創獲，王遠同樣從善如流。〈天問〉「崑崙縣圃，其尻安在」，王遠攷云：「尻舊注與居同，從几。陸時雍釋作脊骨盡處，則字當從九，音苦高反。遠按：陸音釋是也。」(卷三，頁七下)同篇「緣鵠飾玉，后帝是饗」二句，引林雲銘曰：「治象謂之鵠。君子比德于玉，皆克享天心也。何桀承以謀國，終致亡乎？」王遠評析道：「解亦佳，但解飾玉未安。遠意：玉，天子所執之圭。〈考工〉云：『天子用全。』註言：裸器也。裸圭一器，天子全用玉，為之飾玉。似當作如此解。」(卷三，頁一六上至一六下)對於林氏的說法作出了補正。

除此之外，王遠常常根據上下文理推斷詞義，如〈惜往日〉「慙光景之誠信兮」，朱注：「慙見光景，故竄身於幽隱，然亦不敢不為之備也。」⁵⁹而王遠按語則謂：「景，古『影』字。日月照臨，有光有景，人物不能逃，故曰誠信。而我身獨備歷幽隱，不蒙日月之照臨，故見光景而慙也。」(卷四，頁二五下)將一句中的「光景」、「誠信」二語串而講之，更為周詳。又〈離騷〉「倚閭闔兮望予」，王逸云：「使閭人開關，又倚天門望而距我，使我不得入也。」⁶⁰王遠曰：「望予，有旁觀冷笑之意，不必言拒我。」(卷一，頁一五下)觀此節的確沒有明言帝閭不准屈子進入天庭，故把「望予」解作「旁觀冷笑」，其意更堪涵詠。

聲韻

由於字音的變化，先秦時代的不少詩句在後世讀來已經不押韻，於是後人發明了叶韻的辦法，以求音調的諧和。南宋時，朱子是叶韻說的集大成者，在其《詩集傳》、《楚辭集注》中大量運用了叶韻的方法。而朱子之說，又受到吳棫的影響。不過簡而言之，吳棫對於叶韻說持有較負面的態度。如錢大昕指出：「世謂叶音出於吳才老，非也。……朱文公《詩集傳》間取才老之《補音》，而加以叶字，才老書初不云叶也。」⁶¹張世祿《中國音韻學史》則以為，宋代研究古音的學者可分為兩派。以吳棫為代表的一派把韻書上的韻部通合併用，以求古音；以朱子為代表的一派仍轉而採取協句、合韻之例，復倡叶韻。自來都說朱子叶韻之例本於吳氏《毛詩補音》，但此書已經不傳，無從證明，因此我們不能把宋人叶韻之說歸咎於吳氏。吳氏說古音的地方，很多和朱子所注明的協音並不符合，因此推知朱子《詩集傳》等書並非盡用吳氏之說。⁶²吳棫歸韻的方法是給先秦至唐宋韻文的韻腳字標上《廣韻》

⁵⁹ 《楚辭集注》，頁95。

⁶⁰ 《楚辭補注》，頁29。

⁶¹ 清錢大昕：〈韻補跋〉，收入宋吳棫：《韻補》，《百部叢書集成》影印道光楊尚文校刊《連筠簃叢書》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年)，附錄，頁一〇上至一〇下。

⁶² 張世祿：《中國音韻學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年)，頁263-65。

韻目，四聲分列，而平聲分為九部。他不知道古音是發展變化的，而把上古韻只看成是中古韻的簡單合併或通轉。⁶³到了明代後期，叶韻說已經遭到學者的質疑，如陳第提出「時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轉移」，⁶⁴對朱子的叶韻之說作出了有力的駁斥。陳第在考音時，僅採用了單個考訂的方法，尚未及於韻部的劃分。定音僅用直音的方式，常有一字數音的情況。對於語音的轉移，也並沒有進一步作出考證。到明末清初，顧炎武不再把《廣韻》整韻字作為合併單位，而是根據《詩經》等材料的實際離析《唐韻》，重新歸部，為古音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王遠的考音工作，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上進行的。

王遠幾乎在每節都附有考音部份，舉例言之，〈離騷〉「索藟茅以筵筭兮，命靈氛為余占之。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脩而慕之」一節，王遠考音云：「藟，一作瓊。筵，音廷；筭，音專。晦翁云：兩之字自為韻。遠云：『慕』字從莫諧聲，可以韻合。筭占自韻。」(卷一，頁一九下)文字雖然簡短，卻在體例和內容兩端比較全面地呈現出考音部份的特點。體例可歸結為：(一)備異文；(二)標音韻；(三)徵舊說；(四)下按語。而在內容上，以其論「慕」、「合」為韻、「筭」、「占」為韻，可見王遠考據往往有獨到之見。

王遠說：「古音不可求，而古韻相通處最寬也。」(卷四，頁二七上)因此在考音中，王遠雖主要斟酌朱子、吳棫之說，但卻更偏向於吳棫。這在兩方面可以見到：第一，朱子叶韻，是以《廣韻》的韻部為標準的。即使《楚辭》原文韻腳用的是《廣韻》中的鄰韻字，朱子也會以同韻字叶之。吳棫分韻，後人歸納為九部，就很少有朱子這種情況。試舉一例：〈天問〉「應龍何畫，河海何歷」，朱注：「歷，協音勒。」⁶⁵王遠云：「古韻陌、錫相通。」(卷三，頁六上)可知王遠也並不拘於《廣韻》韻部。第二，同攝之字，只要平仄不同，朱子就會叶韻。王遠則指出，古代四聲可以通押，不必叶音。如〈惜誦〉「發憤以抒情」、「指蒼天以為正」二句，朱注：「正，協音征。」⁶⁶遠云：「情、正平去通韻。」(卷四，頁一下)〈惜往日〉「遭讒人而嫉之」、「不清澂其然否」二句，朱注：「否，協音悲。」⁶⁷遠云：「否，方彼反。平上通韻。」(卷四，頁二五上)再觀〈招魂〉「多珍怪些」、「華容備些」、「射替代些」三句，遠云：「古音寘、至、志、霽、祭、泰、卦、怪、夬、隊、代、廢韻通用。」(卷六，頁五下)這自然是繼承了吳棫的方法。

⁶³ 胡安順：《音韻學導論》(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頁242。

⁶⁴ 明陳第：《毛詩古音考》，清嘉慶十年(1805)虞山張氏學津討原刊本(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影印，1990年)，〈自序〉，頁3。

⁶⁵ 《楚辭集注》，頁56。

⁶⁶ 同上注，頁73。

⁶⁷ 同上注，頁94。

顧炎武認為，入聲韻和陰聲韻相配是古音的正宗，這是因為《詩經》中有陰、入相押的情況，《說文》形聲字中也有陰入相諧的現象。⁶⁸ 王遠同樣認為陰入相諧的現象於古韻常見，如〈湘君〉「桂櫂兮蘭枻」至「恩不甚兮輕絕」一節，遠云：「枻音曳，晦翁協音泄。末，吳才老協莫結反。按古音皆有去聲。雪相例反，末莫佩反，絕疾例反。」(卷二，頁四下)這大概是受到顧氏的影響。顧炎武對於方音的意見，也得到王遠的贊同。〈遠遊〉「麗桂樹之冬榮」、「野寂寞而無人」、「掩浮雲而上征」三句，王遠云：「顧亭林先生曰：『「人」字本不與榮、成、征通，然古人于耕、清、青韻中往往有讀入真、諄、臻韻者，當由方音之不同，未可以為據也。』遠云：此語即是。今吾鄉讀真、庚、清韻皆無分別，不知音者囿于風土，翻覺古人分部多事，乃知方音各有是非，未可據此訾彼。」(卷五，頁五下)

《續四庫提要》論王遠雖「於古音方言，辨訂頗詳」，然「審音或未盡洽」。⁶⁹ 以為考音部份也有不足之處。王遠雖贊同顧炎武的一些意見，但顧氏離析《唐韻》、不以《廣韻》韻部為依歸的觀念，王遠卻幾乎毫無提及。此外，對於多音字、破讀字，王遠認為其說始於六朝，前此古人原無此疆彼界之分(卷一，頁一八下)。其言甚可取。可是，另外一些按語的論述卻有與這番說法有所牴觸。如〈離騷〉「余焉能忍與此終古」，遠云：「《集韻》：『古音估者顧也，音顧者始也。』則是古原有上去二音。」(同卷，頁一九上)既然古無破讀，「古」字讀音又何必區分上去？更有甚者，王遠既云「求古人之音，不得以本字為協」，但在按語中有時卻依然採用了叶韻方法。如〈離騷〉「周流乎天余乃下」、「見有娥之佚女」二句，遠云：「下音戶。」(同卷，頁一七下)「九疑續其並迎」、「告余以吉故」二句：「迎，吳才老讀元具反。」(同卷，頁二〇下)〈大司命〉「靈衣兮被被」節：「按古音被音坡，離音羅，為音譌。」(卷二，頁九下)〈天問〉「而抑沉之」、「而賜封之」二句：「沈讀若蟲，與封韻。」(卷三，頁二二上)這些解釋依然沒有擺脫叶韻說的影響。

結語

明代中葉以後，詞章、考據、義理之學在發展和演變中，彼此相互排斥，又相互影響。東林諸子調和朱王，是義理之學內部的融合。焦竑為心學中人，胡應麟為七子殿軍，二人皆精於考據，顯現出義理—考據、詞章—義理之間的影响滲透。至於詞章之學上的師古、師心二說，更分別與心學、古學(考據學)有直接的關係。明末清初的幾十年，不僅在政治上是一個天翻地覆的年代，在學術上也經歷了重

⁶⁸ 明顧炎武：《音學五書》，觀稼樓本(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82年)，頁43。

⁶⁹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頁19-497。

大的變化：陽明心學式微，考據學後來居上。這樣的學風也影響到文壇的好尚，獨抒性靈的公安派、竟陵派風格次第消隱，師古派的格調說逐漸恢復了領導地位。就楚辭學而言，這一時期出現了眾多的楚辭專著，與天啟以前相較，無論在數量和質量上都有了顯著的進步。這些注者大致可以分為三類：如黃文煥、李陳玉本為東林餘裔，在明末身歷黨爭之禍，故其注《騷》亦多抒一己之幽憤；周拱辰、賀貽孫等學本師心，然亦涉獵考據；錢澄之、王夫之則為兼善漢宋之學者。雖然學有不同，但他們的著述都重視考據，而王萌就是在這樣的學術風氣下開始《楚辭》評注工作的。

從本文對《楚辭評註》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到在那個時期，兩代學者不同的治學方法。此書的兩位主要作者王萌、王遠伯侄，一成長於晚明，終老於清初；一出生於鼎革後，約於雍正中葉去世。王萌於童年就受到了竟陵派領袖、鄉賢譚元春的賞識；入清之後，窮愁終老，卻繼續詩歌創作，「著身皆韻」。王萌評注《楚辭》，依然以評文為主；在注解方面的零星創獲，也多是建基於評文的方法，而非從考據小學入手。四庫館臣謂鍾惺、譚元春《詩歸》點逗一二新雋字句，矜為玄妙。此說施於王萌亦然，蓋其評文時，多著眼於字法、句法，甚少論及章法，和鍾、譚點逗字句的方式一脈相承。不過，王萌對李贄、鍾惺等性靈文學領袖的學說不再如前人般奉為圭臬，另一邊廂又完成了《石鼓音義》這樣的考據學著作，可知其學風與明末之人已有涇渭。

至於王遠，一生雖然同樣沒有功名在身，但卻兩度擔任清朝官員的幕僚，並得到青睞，其遭際與乃伯相比，自己不同。康熙中葉以後，明末顧炎武等人倡導的經世學風開始熄滅，但他們對考據學的興趣卻被繼承下來。清廷為了抑制漢族知識份子的反滿情緒，鼓勵學者埋首故紙堆做考據工作，以消磨其意志。因此，王遠等入清後成長的一代人對聲韻訓詁學都或多或少產生了興趣。在《評註》中，聲韻訓詁的工作皆由王遠承擔，可資證明。另者，王萌的評文風格，在王遠身上得到了傳承和發揚；但是在王遠的按語中，明顯沒有了王萌那種獨澆壘塊的寄託之語。王遠雖然也嘗試闡發《楚辭》中的義理，但論其成果，卻遠遠不如他在詞章、考據方面的成績。這是因為當時清廷雖聲言重尊程朱道學，事實上只是為了繼續加強皇權；文字獄的迭興，更使學者噤聲。故此，王遠的楚辭學，呈現出與王萌不同的另一種特色。歷來學者談及《評註》，多將王萌、王遠伯侄混而論之，這是不太相宜的。

《評註》除了反映出時代學風的變化外，在楚辭學上也具備了一定的地位，書中不乏可陳之善。王萌的成績主要在詞章之上，他於評注中探討文義，析論文法，感性點評，寄託抒發，令讀者能較深入地把握《楚辭》作品的思想內涵和文學技巧。然而在注解上，則多以紹述前人之說為主。王遠在其伯的根基上對《楚辭》詞章作出了進一步的賞析。因為他敢於做出合情理的推測，所以道出不少新見。詞章以外，王遠在考據、尤其是訓詁上頗有成績。至於聲韻方面，由於他頗為忽略顧炎

武的新說，所以仍然徘徊在叶韻和《廣韻》的町畦，未能向前邁進一步。對於義理的闡發，王遠也下過一些功夫；但是因局限於身份和時代的背景，令他在這個範疇收穫甚微。

《楚辭評註》一書在康熙、乾隆間重印數次，至少有兩次重印(乾隆二年、乾隆三十五年)是由姚培謙(鱸香居士)負責的。姚氏雖著有《楚辭節注》，但其書極少徵引《評註》。對於《評註》的態度，清代其他注家也與姚氏相近。究其原因，蓋亦與王萌、王遠伯侄的學術取向有關。王萌祖祧竟陵，其評文的語言亦接近坊間的評點文字；而在清代，竟陵派被錢謙益斥為詩妖，評點之術也為通儒以小道譏之。至於王遠，雖致力於考據，但在考音方面仍嫌粗糙，上視顧炎武、下視乾嘉諸老皆不無愧怍。因此，乾隆以來的《楚辭》著作大多只將《評註》目為聊備一格的參考，就不難理解了。

On the Change in Academic Trend during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Viewed through the *Chuci Pingzhu*

(A Summary)

Nicholas L. Chan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orks on the *Chuci* are abundant. The *Chuci pingzhu*, co-authored by Wang Meng and his nephew Wang Yuan, is seldom noticed by modern scholars, who might even mix up the two authors in occasional discussions. This article aims to point ou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uci* study of the two authors. Wang Meng, who was born in Late Ming and passed away in Early Qing, had his achievement mainly in the literary aspect. He discussed comprehensively the purposes and writing skills of the *Chuci* so that readers can better understand the gist of these works. In addition, he expressed the criticisms towards the world he lived, and the sentiments from the fall of the Ming dynasty as well. Wang Meng's approach to study of the *Chuci* was carried on by Wang Yuan, who was born in the Qing dynasty. As an occasional guest counselor to local officials, he persevered in scholarship and surpassed his uncle in semasiological, phonological and philosophical studies. Comparing with his work on semasiology and phonology, Wang Yuan's study in philosophy is much less fruitful, due to his personal background and the contemporary political circumstances. Through explor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wo Wangs' *Chuci* study we can perceive the differences of scholarly methodology between the two generations of scholars. Moreover, we can apprehend the change in the academic trend from Late Ming to Early Qing, and some of the reasons for the change.